祠堂载体设计之道：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活化更新设计的案例透析

陈凌广　陈子坤

摘　要：文章从城乡二元结构、原子化等所引发的公共文化空间供需矛盾，分析其产生矛盾的文化根源，尝试以艺术的方式、方法解决祠堂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化路径，通过“祠堂载体设计”活化更新的样本采集与内涵拓展，立足“腾笼换鸟”，实现功能的优化与整合，提高祠堂载体创新的内生动力，特别是祠堂古戏台载体的设计创新，为学界探索祠堂戏台活化带来了多样化的文化样本，为业界探寻乡村振兴，找到祠堂活化解决问题的路径。文章对钱塘江流域内众多祠堂建筑空间活化案例加以梳理与分析，在结合当地文化资源、创意产业的背景下，提出对代表性祠堂空间进行改造实践，因地制宜促进祠堂活化样本的多样性，让先进文化进入农村祠堂，使之成为培育新式农民的孵化器及促进乡村文化价值形成的助推器，从而最终成为实现乡村文化精神成长的摇篮。

关键词：祠堂载体；艺术活化；乡村公共空间；更新设计

作者简介：陈凌广，男，教授。（浙江传媒学院　公共艺术教育部，浙江　杭州，310018）
陈子坤，男，修士生。（东京女子美术大学，日本　东京）

中图分类号：TU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2020）04-0091-0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受经济欠发达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等因素的制约，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大批青壮年劳力长期外出务工，以老弱、妇幼、中小学生滞留为主的空心村比比皆是，乡村日益呈现原子化①趋势，[1]由于缺少必要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直接导致乡村缺乏创新能力与文化活力，文化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传统形态的乡村的许多公共议题往往在“祠堂社屋”“田间地头”这些公共空间发生，并通过相互沟通交流得以解决，乡村的公共空间潜移默化地对乡村共识的形成、乡村人际关系的融洽、乡村自治的实现以及地区认同的完善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祠堂、村口、广场等为代表的公共空间，承载的是乡村居民的生活习惯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活动，是乡村聚落整体环境的有效组成部分，更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

然而，根据笔者对钱塘江流域祠堂这一民居公共文化空间做的重点走访与调研，祠堂建筑空间老化（除 30%左右恢复祭祀外）、空置率高、能效度低、空间利用率不高等问题突出，缺乏有效的载体，活化之路步履维艰。乡村传统文化复兴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很多乡村社会伴随着人的流动与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呈现去组织化、去合作化、去邻里化的倾向，以社会原子化为特征的社会风险在加剧，宗族观念也变得越来越淡薄，而承载家族兴衰概念内涵的空间载体——祠堂，更是命运堪忧。梁思成曾说过：“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祠堂因其作为村落文化的重要节点，无论是建筑本身的雕饰、建筑空间的等级规模皆堪称华丽，是乡村古建筑的精品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后家族时代’钱塘江流域传统村落祠堂活化路径研究”（17BH168）的阶段性成果。

① 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一般而言，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最先提出社会原子化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田毅鹏教授是国内目前研究社会原子化最有成效的学者之一。

力作。精巧的祠堂木构工艺文化现象是我国极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祠堂与中堂、学堂并称“三堂”，身份认同在祠堂；人的教化在中堂；人文觉醒在学堂。《大学》开篇语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千年乡村的生命线，是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守候的精神堡垒，也是华夏文明的方向。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一系列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化的浪潮中，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流动与迁移、城市化的扩张以及现代人个体意识的过度彰显与家族意识的淡薄等原因，特别是在当下的70后、80后、90后、00后的心目中，家族祠堂无异于历史尘埃的废墟。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实至名归的‘后家族时代’”。[1]若因社会进步而任由该民族遗产走向破败甚至消亡，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

一、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

一边是公共文化空间的缺失，一边是大量构筑精美的宗族祠堂因祭祀、社交功能等的缺失面临着失修、损毁和废弃，即使保存下来也大多处于内容空洞、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学者董磊明认为：“村庄的公共空间的缺失将直接导致乡村人际关系不断疏远，会造成许多人缺乏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与希望。”这种原子化的现象应得到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重视，并积极探寻对有条件的祠堂加以修缮利用，在创新载体上下功夫，寻找活化之道。乡村的文明离不开慈善、互助、生态、道德，乡村的振兴离不开诚信、礼仪、孝道，他们共同组成了乡愁的精神内核。

面对传统村落存在以公共空间为基础的巨大的交往需求和公共生活需求，在新的乡村共同体意识未能形成的状态下，乡村公共生活的缺失，也是导致部分乡村日益凋敝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让大部分已经被废弃的祠堂以包容与创新的文化姿态实现转型，在新的伟大复兴征程中发挥独特的教化功能、留住乡愁功能、保持寻根功能，对其活化的研究成为当下必然。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中国乡村建设之路，本质上就是修复中国文化与精神的碎片，就是从中国文化基因的源头切入，复兴乡村，筑巢引凤，以乡养城，以城助村，承担以文化引领乡建的时代责任，祠堂的活化就是乡建中重要的内容载体。为此，笔者对祠堂活化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学界对钱塘江流域传统村落祠堂建筑的关注主要来自文化学、工艺美术（或雕塑）、建筑三个学科的交叉领域，其研究模式主要有三种：即从宏观到区域、从零星实体到空间整合、从图像学到人类学。其中梁思成、刘敦桢等在20世纪前期就关注到浙江母亲河——钱塘江流域的建筑装饰艺术；陈志华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关注了村落与祠堂建筑风貌、文化功能、建筑艺术等实体研究；巫鸿《武梁祠》等转向节点纹饰研究，向我们展示了祠堂独特文化魅力；日本学者井上彻的《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韩国学者朴元熇的《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等，其主要是依托对宗族学术史的研究，阐述宗法主义；左靖的《汉品01古建筑七面体》关于古建的保护与再利用问题；李文彩的《让先进文化进入农村祠堂》、张卫文的《“旧祠堂新阵地”——吉安市将旧祠堂打造成农村文化室的典型做法及经验启示》指出，注重把公共文化的重点放在基层、放在农村充分发挥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李翔的《浙江祠堂文化的比较性研究——以淳安和温州两地为例》《乡村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以金华市境域祠堂为例》主要针对祠堂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总结了祠堂文化在乡村社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地方政府在祠堂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及对策；各地陆续出现的关于祠堂活化的成功实践案例如：海盐钱氏宗祠变身“钱氏学堂”、梁氏宗祠变身“博物馆”活化凤浦、东莞古祠堂“新生记”传统建筑变身文化新载体、江门“活化”农村祠堂打造“侨”特色文化平台等。显然，祠堂活化为突破口的实践性研究渐成气候。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现象，一些传统文化正在以行政和市场的力量，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活。民间祠堂曾经是中国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农村祭祀祭奠、议论村务、兴学公益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然而，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之初，因种种历史、政治

原因，农村祠堂荒废、破损严重。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旅游经济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祠堂文化再次进入国人的公共生活。鉴于这样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本文以“祠堂空间载体设计之道”为主旨，探索其不同空间功能转换与活化更新的路径，在跨专业综合、在地营造实践、乡土语言的现代化表达等不同纬度的创新实践中，课题组在为期两年多时间对钱塘江流域内众多祠堂建筑空间活化案例加以系统梳理，在结合当地文化资源、创意产业的背景下，提出对代表性祠堂空间进行改造实践，让先进文化进入农村祠堂。

二、“祠堂载体设计”样本

（一）基于乡村民俗博物馆空间展示载体的祠堂活化案例实践

2013 年浙江省就启动了 260 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新建（修缮）1000 个农村文化礼堂，其中海盐钱氏宗祠恢复性维修过程中融入了“文化礼堂”功能元素使其变身“钱氏学堂”；2014 年 3 月 13 日中国建设报《探索古建筑“活化”新路径》着重就中国首个省级“古建筑认领”法规——《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出台，为精准科学活化更新祠堂等古建提供法律保障。这些法规的出台，强化了祠堂建筑文化遗产在利用的同时，要注意从内容、形式上彰显内涵，突出时代和地域的文化元素，“活化”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的生命、新的用途，以“一堂一品”为活化目标，因地制宜促进祠堂活化样本的多样性。

（二）祠堂博物馆功能空间创设，到祠堂展起来

1. 祠堂博物展示留住村民集体记忆

近年来浙江省结合自然生态、民俗文化、农耕文明、传统技艺等地方特色资源，一批宗祠建筑被打造成覆盖全域的乡村特色“生活形态博物馆”（即文化展厅），吸引了不少民众的关注，更为老百姓津津乐道。

（1）独具生活印记的祠堂农耕展示馆的创设。如桐庐县的荻浦申屠宗祠、建德新叶村叶氏支词等就是以展示祖辈传下来的农具、家具等有着时代印痕的老物件、老古董民俗而成为当地中小学校外课堂实践基地，实物展厅的创设使本就厚重的历史记忆多了一份乡愁记忆。

（2）独具旅游功能为一体的祠堂民俗馆设计。在浙江众多祠堂乡村博物馆更新设计案例中，对空间改造较为彻底的要数海盐县沈荡镇中钱村的钱氏宗祠这样的空间改造案例。在 2013 年 10 月进行恢复性维修后，海盐钱氏宗祠依托其博物馆的空间创设，系统梳理钱氏源流从文本、实物加以考证、陈列，将名人文化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志案例的方式成为方志学研究的重要载体。项目除了根据原祠堂功能进行布置，主要对祭祖场景进行场景陈列，其中前厅为“行牌厅”，东西设木架，上插肃静、回避官级品位硬牌等，墙上布置围绕钱氏先祖的功勋、精神内涵等文献资料加以展陈。这样的博物馆空间陈列方式将祭祀文化、族源文化以详实文献方式通过光、声、电的改造加以艺术表达，强化了良好艺术氛围的营造。花厅是每年清明、冬至两次祭祖时摆酒、吃饭、休息之地，也是族中议事中心，这里不仅陈列了康熙皇帝御笔的“清芬世守”匾，壁面悬挂着围绕“耕读传家”为主题线索的书画作品，成为了钱氏学堂的主阵地，为族人专设的“启笔开蒙礼”“成人礼”“礼乐培训”等基地皆落户于此。后厅为“祭祀厅”，中央设壁龛，内供奉列祖列宗神主牌位，现以“家风文化”为主题进行陈设，中间为钱氏先祖五王的画像，两边为海盐钱氏名人代表。海盐钱家祠堂的改造让“千年故事娓娓道来”。这种集展示厅与博物馆陈列为一体的构建方式，不仅使有限空间的功能多样化，极大地提高了使用效率，让祠堂发挥了更为独特的传承经典、凝聚人心的作用，其载体活化之道也成为钱塘江流域内众多祠堂活化极具借鉴意义的成功案例。如今，钱氏宗祠不仅成为本族人精神家园，更成为了吸引游客参观、“打卡”之地。

2. 祠堂非遗载体展示，传承乡村技艺的种子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将“乡村振兴”与乡愁文化相融合，让村民公共生活空间因载体的植入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公共生活，让很多口口相传的技艺文化有了空间文化形态的落脚点，留住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乡村非遗馆”的创设，实际是为乡村文化振兴“铸魂”。

钱塘江源头马金溪畔马金镇姚家村遗存一种民间花灯叫姚家扛灯，又名宫灯，是据传始于唐代，盛于宋元的古代宫廷彩灯的一种，一架扛灯集竹编工艺、剪纸、绘画艺术于一体，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民间工艺品。马金扛灯是浙江开化县级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姚氏宗祠就是一个以陈列和普及制作“姚家宫灯”的祠堂，祠堂内除了供奉姚氏祖像、牌位等祭祀器具，四周墙上展陈有近现代姚氏族众的贤达名士的肖像和事迹，当然，还有制作精美的一盏盏宫灯和详细的宫灯制作工艺流程，包含有材料选择、制作步骤、加工规范，更有宫灯的历史流传故事梗概，其非遗传承人姚有根（63 岁）是马金中学的退休教师，也是目前姚家宫灯唯一的传承人。每年的正月十五，姚氏族人举办元宵灯会，都会制作扛灯巡游村舍及至田间，一为纪念先祖，二为来年庄稼免受天灾，祈求有个好收成。如今，姚氏宗祠内每年还要举办大大小小的节庆祭祀、婚丧酒席。姚氏宗祠与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祖辈的历史变迁、世代传承的工艺技术、游子心心念念的乡土美食，共同绘制起了老一辈人的美好记忆，更唤起了游子们对家乡的自豪与眷念。通过祠堂一批非遗项目的陈列，将民间艺术、民间工艺、农家技艺、民间民俗等特色文化通过祠堂空间的有效载体转换得以传承和保护，让基层群众在享受文化普惠服务中体味到乡情，推动着乡村文化进一步的繁荣发展。

3. 祠堂空间艺术载体植入，传播着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提过：“艺术要为人民画像，为时代讴歌！”课题组以祠堂为空间载体，组织了数批艺术家对祠堂内发生的人和事、建筑构件装饰、建筑空间形态进行专题绘画创作，艺术家通过人物速写、肖像创作、建筑素材描绘等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

2019 年 12 月 1 日，笔者组织了国内部分艺术家开展了“水墨开化，筑梦同舟”——当代中国画名家走进祠堂写生活动，并在大溪边村的余氏宗祠内挥毫泼墨、写生创作，当地村民闻讯纷纷聚集到祠堂来围观，争相一睹艺术家笔下的祠堂建筑与画中的自己，以绘画作品的方式艺术化地记录着祠堂的诸多功能，创造性地表现这一历史文化遗产。项目组成员、温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谢子静教授长期研究祠堂戏台绘画艺术，她借鉴祠堂戏台装饰纹样，创作了中国画作品《传承·蜕变》，在“大潮涌进——浙江省第十四届美术作品展览”中斩获优秀奖，祠堂成为艺术家创作丰富的素材库。一方面，祠堂艺术创作有助于留存建筑历史状貌；另一方面，古祠堂宣扬的成才观或雕琢于牛腿、雀替，或镶嵌于门楼砖雕之上，促成良好的家风代代相传。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间工艺美术资源是我们创新设计的思想宝库。全国院线去年热播的动画电影《哪吒》从电影古建筑场景的设计、人物形象的造型表现，到充满趣味的对白等，均获得如潮好评，而该电影最独特的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崭新的形象、极富创造性的手法重新塑造了一个民众熟知的神话人物形象，就算放在世界动画的视域内依然有极强的辨识度。

（三）基于乡村公共文化艺术场域的祠堂载体设计案例实践

古建筑在保护之时，必须做到新功能、新用途与古建筑气质上的一致，进而提升古建筑的现实价值。回归以祭祀文化传承为特质的公共空间文化生活，是华夏礼仪之邦的重要注解。

1. 公祭文化引领祠堂祭祀内涵的发展

钱塘江的源头衢州市区是圣人孔子后裔的世居地，孔氏南宗家庙是中国仅有的两座孔氏家庙之一。自 2004 年恢复祭孔大典（南孔祭典）以来，逢“五”逢“十”的年份，孔氏南宗家庙都会举行大规模的社会公祭，余下的年份轮流举行孔子文化节和学祭。2018 年 9 月 28 日，浙江衢州举行纪念孔子诞辰 2569 周年祭祀典礼，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再次开启。中外近千名师生齐聚于此参加学祭典礼，纪念孔子诞辰 2569 周年。来自美国、巴西、澳大利亚、苏里南、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亚美尼亚、乌干达、

几内亚、刚果等十国孔子学院的代表敬献花篮。① 孔氏家庙是衢州的城市名片之一，不仅担负着弘扬宗祠祭祀文化的职能，更多的是将祭祀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政府公祭的方式将“南孔儒学”② 思想得以发扬光大。

2. 家祭文化引领族群文化认同

家祭文化引领族群文化认同是浙江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杭州人民进行家风家教建设的独特方式，宣讲《钱氏家训》，正是杭州钱王祠的“元宵祭钱王”的核心内容之一，全体参祭人员齐声高诵家训，神情振奋。“元宵钱王祭”活动自 2008 年恢复以来，每年举行一次，2019 年是第 12 次，所有程序、仪规基本依照古时“祭规条例”不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来自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日本和国内各地的钱氏后裔以及杭州市民参加。

3. 祭祀文化引领乡村旅游文化发展

诸葛后裔有着祭祖的历史渊源和祭祀仪式，每年“大公堂”“丞相祠堂”，都举行奉祀诸葛亮神柱和画像的隆重祭祀仪式。自 1996 年 9 月始，兰溪市举办“诸葛村民俗风情节”，数百名诸葛亮后裔在诸葛村举行隆重、古朴、庄严的祭祖祭典活动。其祭祖祭品遵敕用“一品物”，即“猪一口，羊一羧，米、面、食共五品，果子五品，肉醢、鱼醢、菹茶共五品，香一炷，台烛一对，帛一段，酒二瓶，行三献礼仪”。主祭人一般由仲、孟、季三族中请 50 岁以上长者轮流担任。规模大的祭祀仪式和迎会，三至五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祭祀仪式近年来均放在农历八月二十八这天举行。此后，诸葛村每年都举行春、秋两祭，规模有大有小。诸葛村依托完善的古建筑群保护措施，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纷至沓来，特别是祭祀时节。

4. 祠堂成为大学生创作写生的对象

钱塘江流域祠堂建筑空间籍以“三雕工艺”（木、砖、石）之大成而著称，无论门檐梁柱、斗拱雀替、牛腿槛窗都以精雕细琢、做工考究而为之，是民间艺术智慧的结晶。钱塘江流域传统村落祠堂不仅数量多，空间规模也宏大，如被誉为“画里乡村——宏村”是歙县著名旅游胜地，是全国著名的写生基地，歙县与浙江淳安县、开化县毗邻，是钱塘江支流新安江的腹地。宏村的“汪氏宗祠”便位于宏村中月塘北畔正中，建于明永乐年间，临水而建，门楼平檐廊道三开间设计，建筑砖墙围护，大门砖雕贴墙，主祠分门厅、大厅、享堂三进，52 根柱落地，梁柱皆巨木，雕饰精美整体，祠堂与月沼一起同为宏村中心重要节点，位置显赫，每年从 5 月开始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艺术类大学生纷至沓来，围坐在宏村的角角落落，以画笔、油彩描绘着这些历史建筑。杭州桐庐荻浦申屠宗祠，始建于明代，乾隆 30 年重修，平檐八字廊道式祠门，三进两天井，五开间，六架五步梁减柱，采用圆形石柱，因其宽阔的内设空间，具有展线长、采光充沛，稍加改造就是很好的展陈空间，现家正堂内倡导孝义忠廉，至今族人家风醇厚、风清气正。

祠堂“保育”和“活化”不是单纯的保护与保存，而是将祭祀、聚会、议事、倡学、教化、展览、展示等诸功能以可持续的方式活化更新，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屹立在钱江两岸上的数以千计的古祠堂正以别样的姿态传播着中华民族新型价值观，诉说着新时代的“中国梦”。

（四）基于祠堂戏剧空间的载体创新与活化案例实践

浙江省是戏剧大省，南戏之故乡，正所谓“一部戏剧史，半部在浙江”之誉。据史料记载，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戏剧就有 56 项之多，其中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戏剧有 24 项，涉及 65 个保护地。笔者认为，浙江戏剧的繁盛与遍布各村镇的祠堂戏台不无关系。祠堂本身从设计之初就具备良好的演艺空间的先天资本。地处钱塘江流域腹地的浙江中西部的大部分祠堂都建有戏

---

① 参见中新网 2018. 09. 28，周禹龙，孔氏南宗家庙浙江衢州孔庙，举行孔子诞辰 2569 周年祭祀典礼。

② 学者何蔚萍曾提出，“南孔儒学”的核心价值在于“由经世而为致用”，它推动了整个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且催生了近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直接作用于长三角经济和珠三角经济社会的发展。

台，古人每逢重大节庆活动除了祭祀这一重要的礼仪活动，请戏班子演戏可是最为普遍的娱乐活动。进入新时代，祠堂古戏台载体的设计创新，为学界探索祠堂戏台活化带来了多样化的文化样本，为业界探寻乡村振兴找到祠堂活化解决问题的路径。

1. 祠堂演艺空间带活乡村娱乐文化

古时在戏台上演出时，灯火辉煌里，台上的表演和楼檐上的各色雕饰融为一体，戏里戏外别有一番艺术风味。从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来看，浙西乡民对戏剧演出表现出特别的嗜好，不仅迎神赛会、婚丧喜庆要演戏，而且在诉讼之后还要对败诉者罚戏，柯城区航埠镇更有“乾隆罚戏”的民间故事流传。[2]

（1）传统剧目的古戏台再现。建德市新叶村叶氏支祠的祠堂戏台上至今还上演着被当地人称“草昆”的这一地方戏剧昆曲，该戏剧发祥自清朝道光年间，距今有二百多年历史。2009 年，新叶昆曲列入浙江省“非遗”，时年八十多岁的叶昭标是新叶昆曲传承人，每逢村中有重大节庆活动，几个老戏骨都会架起锣鼓、二胡、唢呐组成的草昆乐队、戏班表演一番，戏台上那一唱三叹、婉转动听的旋律，经常会博得满堂喝彩，深受村民喜爱。2009 年 9 月，笔者受邀出席建德市政府主办的新叶古村保护专家论证会，并受聘担任新叶古村保护专家委员，草昆戏班子专门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时年 88 岁）谢辰生、著名古建专家清华大学陈志华（时年 83 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廷芳等众专家作了专场演出，赢得了古建保护专家团成员们的好评。时至今日，极具民间特色的“新叶昆曲”依然活跃在叶氏祠堂的戏台上，每逢祠堂内曲艺婉转时，必成为新叶古村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另外，如开化马金镇霞山村每年正月廿二举行的省级非遗项目“花草堂”“跳魁星”“高敲竹马舞”等民间戏曲流传也都会在祠堂戏台上演绎。

（2）现代乡村实景剧的兴起。随着现代大规模剧场空间的兴起，戏剧在光、声、电、影像媒体、LED 大屏等现代化设施的冲击下，祠堂剧场空间因其建筑功能的退化、声、光、电的不配套、舞台空间规模等客观因素的的局限性，单一的文化剧种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乡村群众的审美诉求，一种以微型现代音乐剧、舞剧为切入的祠堂音乐剧因运而生。2019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第 13 版刊发了江山文化礼堂建设发展的盛况，其中就有江山大陈村活跃着正在农村文化礼堂（汪氏宗祠）的舞台上紧锣密鼓排练着乡村实景剧《你好，江山》，展现着大陈发展变迁以及独特的民俗风情。笔者的项目成员、国家一级演员金艳领衔执导的祠堂（戏台）红色文化音乐剧创作项目也在积极打磨中。

2. 祠堂演艺空间创新带来娱乐新风尚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深入推进，如何以与时俱进的开放姿态，创新农村娱乐新风尚，满足农村公共娱乐文化新诉求？面对新时代文化命题，项目组以祠堂戏台为学术阵地，尝试创设一种以现代音乐、舞蹈及书画创作等相结合的跨界融合的新农村艺术样本——“雅集”“音乐汇”等，项目依托政府为组织后盾，与地方专业院团开展校地合作，创新祠堂戏台娱乐空间的新型转换方式，形成现代时尚元素导入祠堂演绎空间的案例成果。

（1）“时思雅集”创新祠堂戏台活化新样式。2018 年 1 月 13 日，由景宁县人民政府、浙江传媒学院联合主办，景宁县文化旅游局、大漈乡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钱塘江流域传统村落祠堂建筑艺术文化活化路径研究”（笔者为项目主持人）开题报告会暨“时思雅集”在景宁县大漈乡时思寺举行，这是一台集蒙古舞（独舞）、古筝曲（独奏）、现代舞（独舞）、景宁畲族民族舞（团体）、书法创作、中国画创作为一体的“雅集”活动，到场老百姓在祠堂戏台上领略了一场由国家级专业演员、演出团体、艺术名家现场创作的跨界秀，祠堂不仅活了起来，更是“嗨”了起来，当地老百姓们由衷地感叹：“没想到在家门口、在祠堂里也能看到这样高水平的文化盛宴，值了！”景宁县文化广电新闻局局长林旭虹在开幕式上这样提到：“这次‘时思雅集’活动在我梅氏宗祠举行，是全力推动文化的项目化、有形化和精品化，对祠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畲族文化保护、群众文化繁

荣、文化精品打造等方面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2）“音乐汇”搭建戏台视听场景的多维体验。2019 年是建国 70 周年，为弘扬红色文化主旋律为祖国庆生，笔者领衔的项目组又策划了一场以现代音乐嵌入祠堂戏台空间为特色的“音乐汇”，以“艺术助推乡村振兴，红色文化走进祠堂”为主题，音乐汇从祠堂舞美设计、灯光音响、节目创排、音乐剪辑等诸多环节入手，突出红色主题的编创，形成了极具推广价值的祠堂戏台创新的活化样本。2019 年 11 月 23 日，“音乐汇”在浙江省江山市大陈汪氏宗祠内上演。经过精巧的舞台改造，巧妙地将原有的戏台作了梯度延伸，适应了现代舞蹈的空间展演；大型 LED 彩屏的搭建，有效地分割了剧场空间的立体维度，使舞台内涵演绎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一系列眩目的立体灯光束伴随着激越的低音炮音响设计，映衬着绚丽而古雅的古建木结构构件装饰，让悠久历史的时空与当下时尚舞台实现梦幻般的契合；极具金属味的大功率音乐声线在舞台两边激越响起时，人们似乎忘却了这是一座历经沧桑的古老戏台，祠堂戏台、天井、明间所围合而成的独特的半开放式观演空间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对话空间，大功率音响组合设计，让四合院产生了身临其境的音乐效果。

（3）节目编创的适性特色突出主旋律文化的感召功能。祠堂古戏台是为传统戏剧服务的，其空间普遍都比较局促，为适应现代“音乐汇”对戏台空间的面积需求，项目组借助古戏台向天井加伸搭建了一个 5×8 米的舞台，与古戏台形成有效的梯度双层改造，使原有面积拓展两倍。经过精心编排的原创节目，为古戏台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盛宴。由 20 名大陈小学学生合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开启了为祖国 70 周年庆生的序幕；由浙江传媒学院音乐学院教师李立平所饰演毛润之（国家艺术基金重大音乐剧项目《红船往事》）的角色成功演绎；由青年舞蹈家金艳教授创编，经过浙江传媒学院 27 位舞蹈专业大学生表演，一部反映红军长征途中发生在祠堂里的、反映军民鱼水情的红色舞剧片断《半条被子》赢得了现场数百村民的热情掌声，让大陈村这个以“村歌带动党建”的文明村再一次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起到了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音乐汇”让“送戏下乡，活化乡村戏剧空间；院村携手，共兴乡村文化”的校地合作模式成为可能，为祠堂活化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案例与样本。歌曲主唱、大陈村村支书汪衍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由衷地感叹：“这是一场别样的党史教育，一曲高雅的文化赞歌!”乡村祠堂的振兴关键在于载体的设计与创新。

（4）线上、线下的视听融合实现全媒体传播的最大赋能。全媒体指的是 5G 驱动下的信息通畅、便捷与传播大集成，是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网络直播、短视频等传统媒体、新兴媒体、智能媒体的全信息综合化、立体化、一体化。[3]课题组通过全媒体的传播方式，组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自媒体等数十家媒体对“音乐汇”进行现场报道，在直播网络平台——雅昌“艺术头条”号上进行同步直播，当晚的网络直播、电视直播的收视率达数十万之众，特别是经人民政协报记者李宏采写的《重塑农民“精神家园”，让祠堂文化活起来》等媒体的报道，引发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古老的大陈汪氏宗祠因“音乐汇”而焕发光彩。“音乐汇”为政府破解祠堂活化这一困扰乡村振兴主体的老大难问题，在 5G 赋能的驱使下“老树新花”。

祠堂载体的设计创新促成红色基因在祠堂空间悄然落地生根，更让古老的祠堂戏台焕发出独具特色的现代性，引领着乡村文化的时尚诉求，也为探索乡村祠堂活化找到了鲜活的样本与路径。

三、结论与建议

结合上述的样本实践，可以总结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载体设计创新之道，适时将因村、因物、因时的本土化建设理念纳入文化、旅游、倡学、教化、村民集体记忆等“活化”范畴，实现化解乡村原子化危机。面对以祠堂为代表的传统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乏力，全面提升乡村文化创新能力与文化活力，通过传统空间与当下人文体系的重构，去打造特色化的宗祠文化，重塑农民的“精神家园”。

（一）祠堂博物展示文化成就青少年未来

随着时代发展，从前的老活计、老物件、老行当，承载着记忆，成为了记忆，宗祠集祭祀文化、族源文化、方志文化、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博物馆空间功能设计，不仅有利祠堂的延续与活化，很多祠堂非遗馆里还摆设着农家使用过的生产工具、家具、生活用品以及民间艺术装饰品等物品。非遗传承人会定期到祠堂进行技艺表演，与观众形成良好的互动，附近的中小学定期到祠堂观摩学习，传承技艺，让祠堂成为校园课堂的延伸。

（二）激发乡村祠堂内生文化力量，繁荣公共文化空间的载体功能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波认为："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给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作为农村居民人际交往、信息集散的重要空间，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激发农村内生文化力量、克服传统文化管理和供给模式弊端、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途径。"[4]在之前，祠堂历来是乡村聚落公共文化空间最重要的载体和场所，如前文所述，随着祠堂内生文化力量的不断增强，以祠堂为载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将成为农村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载体，不仅具有地理学上的物理空间，还具有文化学上的精神空间。

（三）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性，保护祠堂作为公共文化功能的物理属性

乡村祠堂公共文化空间可以通过历史传说、社会遗存、农耕技艺、文化生活、手工业传承等载体内容的设计，来全面展示乡村文化生活。祠堂建筑不仅是乡土建筑艺术文化的代表，更是千百年来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在文化同质化日益加剧的今天，祠堂往往代表的是一个村落特殊的文化标识，不仅承担着文化服务功能，还是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

（四）优化基层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凸显祠堂在乡村治理中突出地位

祠堂公共文化空间还应积极以构建集家风文化、礼仪传承、非遗传播、教育孵化、文化娱乐、乡贤文化传播等于一体的多功能、体验性强的公共文化空间，共同打造以"文化磁场"效应为目标的效用空间，让文化惠民工程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对原生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便指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祠堂空间集乡音、乡情、乡土、乡景、乡邻、乡德等乡村文化资源于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祠堂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工程与乡村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等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一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砖添瓦"。

总之，在当前中央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战获得全面胜利的关键历史机遇面前，通过"祠堂载体设计创新"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能够重新焕发生命力，将有利于推动建构乡村互助合作的文化氛围的形成，有助于乡村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等村庄共同体意识的重构，将唤起农民对乡村生活的认同感、幸福感，使之成为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驱动乡村发展、培育新式农民的孵化器，成为促进新的乡村文化价值形成的助推器，从而最终成为乡村精神成长的摇篮。

参考文献：

[1] 张邦卫．"后家族时代"与浙江祠堂文化的传播策略［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5）．
[2] 陈凌广．浙西祠堂［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79.
[3] 曾静平，王友良．5G 赋能时刻：全媒体，全素养［J］．未来传播（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20（2）．
[4] 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人民论坛，2018（21）．

［责任编辑：高辛凡］